

在剛剛結束的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 2013 年夏季高峰會上,某著名企業家一開口就戰旗高揚:“政府應該是制定法律和規則的人,但是你這個法律和規則得符合天理。如果政府制定了一個法律和規則不符合天理的時候,人們就被逼得不得不推翻它。”

在他眼里,中國政府不僅不符合他所說的“天理”,而且還很愚蠢,他又說道:“如果我們是一個既有符合天理的法何必要去找事呢?那不挺好嗎?又符合天理又合法的,就按照這個辦吧?恰恰是因為我們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老想找一個特色,於是就和法和天理之間有了一個衝突。為此,人們不得不找事。”

亞布力論壇上的某些人,一屆比一屆急躁,莫名地要發怒。中國其他方面的大事無論多大他們也都不很關心,念茲在茲顛來倒去的就是一件,他們稱之為“改革”,但又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改革,而是他們所特指的一種改革,只與國家政治有關,只與政府體制有關。

如今已拔高到了“天理”這個高度,可見其急躁程度。發言者說,他深受某導師的教導,這就很清楚了,“天理”之論來自“天則”,那里的人一直都很急躁。

饒有興味地讀了岑少宇本周《兇猛野獸是怎樣來到我們身邊的——藏獒神話在中國的三十年氾濫歷程》一文,頗有所得。

藏獒,一個原本無甚特別之處、智商平平、工作服從性不強、基本上可以鑒定為“又兇又笨的大狗一只”的犬種,在虛榮的豢養者、精明的投機者、幫閑的炒作者、盲目的跟風者等不同人群的共同推動下,成了一個氾濫在中國大地上的蹺腳神話,碩大的狗頭盤上了光環,一身的贅肉也有了價碼,在泡沫飛騰的最後瘋狂之中,連“獒文化”也翩翩而出,招搖過市。

藏獒本身無辜。它們本來就很笨,對於為什麼人們會把它們成群結隊從西藏光禿禿的山嶺上帶到平原的城市里,又為什麼讓它們集體站在展銷會的展台上面對台下烏泱泱笑嘻嘻的人群,又為什麼把它們一只只領進居民社區被不同的主人像親生兒子一樣供養起來並跟着主人一起溜大街逛商店進餐館,它們統統搞不懂,也無意搞懂。

但它們本來就很兇,並不會因為進了城市、上了展合、當了兒子就改變掉原始的兇猛本性。於是,不定哪一天,它們突然覺得身邊的活人很像是西藏荒山上偶爾冒出來的一只兔子,於是,在原始捕食天性的生物學作用下,前爪一撲、大嘴一張、利齒一咬……

藏獒的故事,撇掉了神話傳說和文化圖騰泡沫之後,就这么簡單。歸根結底,是人而不是狗,是那個把它們領進人口稠密的居民社區的利益同盟,製造了藏獒爪下的犧牲者。

其實,類似的故事極多,只要利益同盟形成,消費者、投機者、炒作者、跟風者一個不缺,任何一個東西,都可以成為新神話、新圖騰的承載物。不同之處只在于,如果是一個關於金魚的神話或關於鸚鵡的圖騰,最多有人因為輕信上當而賠錢,還不至於被金魚或鸚鵡咬死而賠上性命。

由此可見,雖然不能阻止荒誕神話的此起彼落,也可以承認神話泡沫的某種市場合理性,但至少也要將兇猛的東西單獨分列出來;在接受市場經濟各種不利方面、有害方面的同時,也能將那些最兇猛、最有害、甚至可以致人死地的藏獒類事物隔離起來,以避免毀滅性的災難無法阻擋地發生。

很多事情內在的道理相通。將藏獒進社區一事與資本自由化一事對照着看,兩者相似之處極多。

首先,資本有天性,就是不顧一切地逐利,這點很像是具有攻擊和捕食天性的藏獒。

而資本一旦不受管制,甚至以自由的名義故意放任它的運用,必然會對社會造成嚴重破壞。因為對弱勢人群的掠奪、對簡單勞動的剝削,正是它最理想、最美妙的運用,用經濟學術語說,就是最優化的資源配置。這一點,也像極了被放進居民小區、又被松了狗繩、甚至以“優化資源配置”或“自動實現均衡”等理論做後盾任其撒野沖進人群的藏獒。

除了以上兩點之外,資本與藏獒之間的最相像之處,還在于與利益同盟共同作案這一點。可以說,資本本身無辜,用好了還能造福,正如藏獒本身無辜,用好了也能造福一樣。所以,人如何利用資本,是遠比資本如何擺脫人的約束更為重要的問題。面對一只藏獒,你不能只考慮如何讓它擺脫人的管束,而更應該考慮如何利用它的價值,兩者的道理一樣。

但是,恰恰有人希望解放藏獒、放縱藏獒、讓它們擺脫所有管束,因為他們在城市居民社區這個原本不應該出現藏獒的地方,發現了巨大的消費市場。於是,一個集合了消費者、投機者、炒作者、跟風者等各色人等的利益同盟形成了,在這個利益同盟翻雲覆雨推波助瀾的操作之下,藏獒們成群結隊地從雪域高原上下來

編者按:我在 2011 年 9 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 1957 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者,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 浦瑛



作者: 文揚

## 和中國企業家們談談“天理”

確切說,這一派並不是成形于相同的政治觀點,而是聚合於同一種思維方式。

對於這一特別的思維方式,人們的批判已經很多,但還是會震驚於其頑固性:第一、無論國內國際形勢怎么變,也無論學術前沿有什么進展,他們還是一如既往地堅持那一套陳舊的抽象理論,幾十年不變;第二、無論真實的現實與之距離多遠,複雜的程度超出多大,他們還是一如既往地要應用這套過時的理論解釋現實,甚至要求現實,幾十年不變。

瞭,然後分頭沖進了城市社區,撲向了那些還在晃悠悠走路的孩子們。

當前,被中國資本賬戶不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不可兌換這個宏觀金融政策擋在國門之外的國際資本,就像極了暫時還被隔離在雪域高原上的藏獒群。但是,在國內,迎接國際資本藏獒群下山進城的利益同盟已經形成,強大的需求已經產生,準備借機發財、借機出名、借機攪合、借機幫閑、借機搗亂的各類人群也都齊備了,只等金融政策改革、資本賬戶開放,他們的大買賣就來了。

一如既往,這一切都會打着改革的旗號,以自由的名義進行。搞資本投機是自由,借資本獲利是自由,拆解政府管治措施、宣傳資本自由的好處、鬆懈人民對投機資本的警惕、協助熱錢大舉進入,所有這些都是自由。就像是自由地輸入藏獒、炒作藏獒、倒賣藏獒、私養藏獒這一連串自由的共謀一樣。

當然,最終一定會有自由的犧牲品,也許是你我,也許是國家,但在這一切發生之前,他們這些自由販子們,已經在自由化大亂局中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了。

所有這一切,都像中午太陽底下一般明明白白的事。上世紀 90 年代的俄羅斯,是在自由化大亂局中被瓜分的;本世紀 10 年代的伊拉克,是在自由化大亂局中被毀滅的;當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後來的全球金融海嘯,都是在資本自由化大亂局中沖天而起的。但奇怪的是,所有這些,似乎都不妨礙中國的自由化鼓吹者們三十年不變、一個字不改地重複着關於自由的陳詞濫調。不僅如此,他們還越來越有紧迫感,越來越時不我待只爭朝夕,在最近的討論中,他們已經急要推出資本賬戶開放的時間表了。

我一直不明白,他們到底在急干什么?藏獒的擁有者、倒賣者、豢養者、投機者,這幾個角色中,到底是誰,最急于干成這件讓藏獒進社區的事?

當年那位俄羅斯最大的寡頭別列佐夫斯基,一個人擁有俄羅斯最大的汽車公司、航空公司、石油公司、銀行和電視台,放在中國,又好像是一汽大衆、中國國航、中石油、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央電視台都落進一個靠倒買倒賣起家的個體商人之手。而這麼做的名義和說法,就是自由化,就是資源優化配置,就是最徹底的改革。莫非,我們這些天天在高喊自由化的經濟學家、企業家、政府官員們,也是在做同樣一個寡頭夢?

或者,他們只是代理人,他們是在替其委託人着想:中國這個最大的社區人口稠密,毫無防護能力的老弱婦孺衆多,是時候讓華爾街那些最大型、最烈性的藏獒沖進來飽餐一頓了。

無論哪種情況,是準備自己玩,還是代理別人玩,是準備做強盜,還是準備做小偷,說出來的話,卻都是一如既往地以“改革”起頭,用“自由”開道。

2003 年 4 月上旬,美英聯軍地面部隊進入巴格達,隨即發生了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檔案館遭到重大洗劫的文物災難,世界輿論嘩然。還記得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拉姆斯菲爾德,面對潮水般的問責,竟然拋出一句:這是自由難免的瑕疵,自由的人民也有犯錯誤甚至犯罪的自由!

真要感謝這位美國政府高官,讓自由的另一副面孔大亮相:我們就是十足的罪犯,我們要的就是犯罪的自由!請你們不要妨礙我們犯罪的自由!

藏獒無辜,資本無辜,自由無辜,但明明知道藏獒可能傷人、資本可能害人,卻故意要以自由之名,要求解除所有管治,任憑它們去自由地傷人害人的那些人,就是罪犯

文揚 2013 年 07 月 07 日

思維的偏執,看起來甚至有些可怕。能讓一個最應該懂得什么叫腳踏實地的房地產商人,也一天到晚飄在半空中的“天理”里面唸唸有詞、自說自話,甚至還越說越有理,情急處,一個人上演堂吉訶德大戰風車,挑戰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我們可敬的“自由市場經濟學”,怎么也快成邪教了?

中邪之前的企業家們,一定比現在更明白事理,一定會覺得下面這些道理更像是真正的“天理”:

首先一點,中國大陸的民營企業家,作為一個社會集團,只是個新生兒。它誕生於改革之初,與開放進程一起成長到現在,最老的民營公司,到今天也還不足四十歲。

歷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私人公司,放在世界上比較,就是嬰幼兒。全世界最老的公司,甚至有一千多歲,一家日本建築公司從公元 6 世紀一直持續經營到現代,前些年才剛剛被一家大公司並購。更多的是具有幾百年歷史的家族公司,在日本、意大利、法國、德國、瑞典都有一些,而中國從來沒有,從歷史上就沒有。

與這些歷史悠久、傳承數十代的家族公司相比,中國的民營公司統統都屬於第一代,在世界福布斯財富排行榜上,全部被標示為“白手起家”。如今已聲名赫赫的這一批中國億萬富翁,每個人都有一個從零開始的創業故事。這就意味着,公司迄今為止的整部歷史,創業和成長的過程佔了大部分時間,也就是最近幾年,這一群原本並不知道自己會成為什么人的打拼者,才剛剛顧得上抬頭看看周圍的人間萬物,看看社會和國家,看看世界和歷史。

承認嗎?承認中國民營企業只是世界私人企業大家族中一群剛剛問世的嬰幼兒,就會進一步承認下面這個更真切的“天理”。

當這群嬰幼兒高調宣稱要介入政治、干涉政治時,其實他們完全不懂得企業與政府在歷史上是什麼樣的關係。

事實上,在那些私人企業群體的歷史比現代國家本身的歷史還要悠久的社會里,這個政治上資深、經濟上強大的群體本身,就是所在國家的建國者和立國者。正是這些私人大財產者、大土地主、大資本家,出于本集團、本階層的利益,通過一整套制度設計,通過一系列政治協商,創立了憲政這個政體形式,也創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

建國前他們是統治者,建國時他們是締造者,建國後他們是主導者,對他們來說,從不存在要不要談政治的問題,他們本身就是政治,現代國家的現代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圈內的“私事”。

新生的中國企業家們,再幼稚無知,也還不至於真的以為英國的形成是赤貧工人起義的結果、美國的建立是無地農民革命的產物。西方之所以是西方,美國之所以是美國,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國家的形成、政制的設立、政治的演進過程中,大財產者和大企業家才是真正的主導者,人民始終是被動接受者。

這樣看就清楚了。我們這些只有二三十年企業歷史的私營企業家們,你們的企業和所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是什么關係呢?

有哪個企業為建國做過貢獻嗎?有哪位公司前輩是國家締造者之一嗎?一個新群體,在國家早已完成了建國和強國過程三十年之後才剛剛誕生,剛剛纔積累了些財富,就要挑戰整個國家和社會,大談“天理”、“天則”,因為覺得政府妨礙了自己發財,就高喊着要推翻政府,改造國家,天底下見過这么胡鬧的孩子嗎?

中國現在這個國家,從新國家本身的歷史算,比私營企業群體的歷史長一倍;從執政黨的歷史算,長兩倍;從對明清的繼承上算,長二十倍;從對秦漢的繼承上算,長七十倍。其中包含的全部“天理”和“天則”,是孩子們一輩子也讀不完的學問。

亞布力論壇上真的要談“天理”嗎?先搞懂基本道理再說吧!

文揚 2013 年 8 月 30 日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BMD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网站: www.bmdllc.com



唐永昶律师  
电话: 330-752-1959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jxu@bmdllc.com